



編輯先生：

感謝你們辛勤的工作，將一期期豐盛的「書評書目」交到我們手上。

詹宏志先生寫的「每月短篇小說評介」是很令人敬服的，尤其他對文學前途的感時憂懷常使有志於文學工作者們深受感染而引發沉思和討論。在九十三期的「書評書目」，詹先生發表的「兩種文學心靈」中又道出他對未來的嘆息和隱憂，披閱再三，總似有些意見如鯁在喉，却自覺才識學養不如詹先生遠甚，久久不敢遽然提筆發為議論。經數週靜思，仍覺「有話想說」，實非正式為文就教，充其量只是個人的一些看法和觀點而已！果能因此而引起大家的矚目和關切，則是意外收穫了！

我們卅年來的文學努力真會成為「另一種必廢的徒然」嗎？或真如東年先生所預估的「在將來，都只能算是邊疆文學」呢？

文學位置認定的條件絕非單以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劃分為必要或已足。除非我們的根——對民族認同的意識已漸趨隕損、腐蝕，否則我們似無理由妄自菲薄地對今日文學發展抱着過分悲觀的態度。儘管臺灣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制度一直在轉變，文化上也不斷地受到外來影響的衝擊，然而，只要我們所敬奉的主體是那創造了中國歷史的祖先；只要我們體內所流的是近百年來飽受欺凌，並混合着恥辱與挫折的中國人的血液；只要我們所使用的是中國先聖先賢們所創所傳的

文字、語言與思想模式，則我們今日又豈會在三百年後成為「充滿異國情調，只提供浪漫、夢幻與遐思的材料」？

誠然的，國家分裂的悲劇繼續無限期地串演下去，民族文化的意識心態就註定擺脫不了分裂的不幸。回顧中國的歷史，分隔兩地人民於長期對立的政治狀況也不單只是頭一回了。而當分裂的時代結束，復歸一統的新氣象就必然要在文化上開出更光輝，更明媚，更燦爛的花朵。中國的民族性就是這麼經常地注入新元素，始得歷經變亂而仍能屹立，常存的，也因此而使得中國民族性更加地堅韌而富有彈性。這也許不是偉大，却會使我們更愛她，敬她。

我們作家的創作經驗是臺灣的社會，（即使華僑文學或留學生文學也以臺灣為依歸吧！）局面上或嫌狹隘，客觀環境所有意加諸的限制又逼着文學的發展形同裹小腳長大的閨女，在廣度和深度兩方面欠缺令人迴旋轉圓的滿足，但我們並不能就據此說：我們所走的文學道路會或已背離民族總體文學的軌道。我承認：目前這種以臺灣這小塊泥土為根為認同的創作經驗是有其特殊性，但，所謂「民族的總體文學」不就是由各種特殊性所集合而成的嗎？透過「殊相」結成「共相」，如此罷了，焉能否定臺灣的文學創作經驗就不是民族總體經驗的一部分？而「如果我們還能因着血緣繼續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則我們的文學也定然要成為民族文學重要的一脈。

在臺灣，文學脈流的傳承是曾經被腰斬，以致形成臺灣文學界的虛空與混亂，可是時間是一帖治療劑。迷失不會長久的。新生的一代會渴於文化遺產的需索；被切斷的那一段會慢慢被接上去；被砍斫的傷口會逐漸復原。

張系國在「試談民族文學的內容和形式」（載於「書評書目」第廿一期）一文裏說得好：

「現代中國人正置身於一個驚天動地的變局裏。在臺灣和大陸，都正進行龐大的社會實驗，其成敗關係着數億中國人的未來。這一代中國人有着多變的豐富經驗。」

「現代中華民族的經驗是『變化』、是『動』，其經驗的多變，範圍的廣闊，不僅包括了政治上不同的制度，也包括了從戰爭到和平種種人世的悲歡離合。」

我想：假使我們能明確地掌握住這時代這地區裏的巨大的變與動的經驗，以及在各種變局裏的奮鬥事蹟，甚而積極地對苦難挑戰的悲壯情懷，我確信，我們今日的努力必然會得到歷史上肯定的評價，而無需擔憂「成爲旁支的命運。」

文學是民族的良心，作家是時代與社會的良心。作家必須在他所生存的時代與社會裏獨立地思考，自重地觀察，並分享其周遭的同胞所生活的不幸與無奈；然後在創作中，以文學的形式忠實地表現出悲苦的情操，以及掙扎於黑暗時刻的憧憬，和糾纏不清的希望。

我贊同詹先生所說的，作家應當「用一種歷史的眼光來反省自己的創作活動。」然而，作家也絕不能脫離或逃避於他所生存的時代，致使自己的作品架空了。我們還必須明瞭：一個時代的真理乃是經歷了長久痛苦、失敗和犧牲之後才在共享的歡笑中建立的。

偉大的文學心靈並不易求，一切高尚的文學作品絕非在安適如意中蘊育出來的。偉大的創作必是根植於苦難而堅實的土壤裏，拋棄浪漫的虛幻，並且勇於面對各種逼迫而來的邪惡勢力，堅決地，不可妥協地克服環境無理的壓抑。

的確，「歷史像一匹野獸，吞食所有的歡欣、不幸、理想、鮮血、與死」；歷史更像是一場大火，焚燬所有不耐光與熱的雜碎。等火勢熄滅之後，不朽的作品仍將完好無損地留存在灰燼中。偉大的文學心靈，唯有在烈焰無情烘烤後，始得顯現而屹立不屈。

我們不妨設想：倘若歷史提前伸手向我們索取成績，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答覆：「你要怪我們做得不够好，但我們已努力培植了勇氣和信心，也盡力爲時代做了見證。」

敬祝 編安！

呂昱敬拜 一九八一、二、廿三